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列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是中国人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讲信修睦”塑造了中国人亲诚惠容的道德秉性，“亲仁善邻”则是中国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基本原则，这一交往之道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国人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基因。

讲信修睦的道德准则

“讲信修睦”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信，诚也。从人从言。”“信”作为会意字，表示“人言为信”。讲信是修睦的前提，修睦是讲信的结果。

“讲信”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赋予“信”极高的地位，认为“信”是君子立身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君子的基本道德准则，正如车上轅木与横木间的接榫一样，无“信”则无以在社会立足。孔子按照“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的标准来教育弟子，将“讲信”作为修炼理想人格的途径。在儒家思想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信”在传统社会的价值排序中处于较高地位，是君子修身的德性基础。

讲信修睦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信”作为一种自我修养，关涉到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中，“信”并非只是局限于内在德性，而是有着较强的相互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孔子把“信”作为朋友之间的基本道德原则。在和学生们讨论志向的时候，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 李媛媛 刘 凯

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

“亲仁善邻”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说文解字》对于“仁”的解释是：“仁，亲也。”因此，“仁”与“亲”是可对译的。“仁”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奠定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基本底蕴。孔子在不同场合阐释过“仁”，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层次内涵。首先是情感内涵，孔子将“爱人”作为仁的基本要求。这种践行仁德的主动性并不在于外在压力，而在于自身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并指出了达到“仁”的途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则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人人着想，以忠恕之道待人，甚至能成就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亲仁”是邻里和谐的情感条件和道德基础。中国人对待邻里关系的态度是“远亲不如近邻”，和睦的邻里关系是理想生活状态的重要条件。“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人对亲人和邻里怀有美好的祝愿和期望。这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向外推演，便可延伸到天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善邻”由此而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

亲仁善邻是中国传统国与国之间交往之道的基石。中国传统政治秉持“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理念。《孟子》中记载了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够以大国的身份服侍小国，而不是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而只有乐行天命，才能保有天下。因此，“亲仁善邻”所秉承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和为贵”，但“和”不是要求同质性，而是尊重差异性，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达到和合共生。中国历史上对周边的地区和族群极少采用征服、掠夺的方式，而是更多采用“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即便在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也从来没有建立过海外殖民地。这种以友好和平作为前提的交往原则构建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的核心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理想政治的构筑中，“讲信”与“亲仁”都是基本的道德标准，从个人的内在自我修养到外部交往关系，有着清晰的逻辑链条。管子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孟子讲“仁者无敌”。在这样一种“信”和“仁”的交往原则浸润下，小到个体关系之塑造、家庭关系之培育，大到社会关

系之形成、国际关系之构建，美好高尚的交往之道滋润着人心道德，天下和谐之景应运而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中，“讲信”与“修仁”已不单纯是道德层面的修养，而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途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生活，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立德修身为基础的道德性。“讲信”与“亲仁”是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价值基础。《尚书》中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不会对某个人、某个部落、某个民族特别偏爱，只会辅助有德之人、有德之邦，中国的政治文明传统由此确立，即以道德秩序作为基础构建政治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吸引力正是基于道义上的感召力和文化上的凝聚力。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直到今天，这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内核的担当精神依然是中国人矢志坚守的价值追求。

以和合共生为特质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由内部差异巨大的多个族群构成的复合体系，正是在“讲信”和“亲仁”的基础上，以高度

包容的态度不断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才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汇聚百川、融成江海，通过文化认同凝结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很多民族和地区不断交往，中华文化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是以“向内凝聚”的方式将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而非以“向外扩张”的方式用一元文化取代多元文化，由此，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不绝，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

以“天下主义”为愿景的和平性。中国在历史上就有“天下主义”的关怀，是追求和平与稳定的文明型国家，诚信友善、成人成己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走依靠殖民扩张、征服掠夺，靠向外输出战争、攫取他国资源的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中国人倡导诚信友善，反对党同伐异；倡导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放眼今天的世界，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日渐蔓延，面对以邻为壑、转嫁危机，中国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和文明实践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为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安全难题、治理难题，探索世界更美好的发展前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官箴》之后有《百官箴》

□ 郝金金

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尧舜好仁，天下景从，尚焉用讼仇也。”所以为政者何不施行仁政呢？这样做，才能修齐治平。尧舜施生爱人，天下百姓都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哪里用得着法律诉讼来管理百姓？为政者施行仁政，勤政爱民，无施淫度，百姓就会如影随形，天下太平；反之，为政者推行暴政，不体恤老百姓，他们就会反其令而行，反其好而施，国治天下平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政者要富民。唯有富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许月卿说：“古者官养民，今也民养官。以民养官，犹之可言，更肆剥削，其何以堪，为民父母，宁不动心。”古代都是官员养育百姓，现在却是百姓养着官员。以民养官，这是盘剥百姓，作为父母官难道不痛心吗？“藏富于国，民贫则乱；藏富于民，国赖民安。”国家垄断了财富，百姓贫穷就会造成叛乱，将财富让于百姓，就会国泰民安。“视民如伤，岂无遗利，听民与藏，念彼茧丝，曷如保障。”因此，要注意保护百姓，让他们积累财富，使他们衣食无忧，生活有保障。百姓为国之根本，他们辛勤劳动创造了财富，为政者不可将财富完全据为己有，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老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相反，国家富了，老百姓穷了，国家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就会大乱。

为政者贵在息民。让民众休养生息，是为政者的职责所在。许月卿引用“《穀梁传》：惟时惟度，民勤于力，宜省功筑；民勤于财，宜轻赋税；民勤于食，宜废百事”来说明为政者要考虑时节，不能没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比如老百姓辛勤劳动，统治者要减少宫廷营造，老百姓创造了财富，统治者应轻徭薄赋，老百姓辛苦地耕种，统治者应废除杂役。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石，国家政通人和，关键在于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为此，为政者要注意息民之力，创造物质财富，不可奢侈淫逸，浪费民力。

《百官箴》的作者许月卿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人），宋理宗时进士及第，曾做过司户参军、江西提举等官职，后因贾似道当权而去官归隐，著书立说，世称山屋先生。《百官箴》是许月卿仿照汉代扬雄《官箴》的结构所著，《四库全书》收录其中。此书之所以名为《百官箴》，是因为书中收集了上至左丞相下至州县等各种级别文武百官的箴言，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丰富的民本思想。

为政者首先要爱民。许月卿以尧舜、桀纣为例分析了他们对百姓不同态度产生的不同结果，“尧舜率天下以仁，民如风，桀纣率天下以暴，民应如响。”尧舜以仁爱百姓来统治天下，老百姓如风吹草倒一样而归顺，桀纣的统治则是以暴虐来威逼百姓，所以武王伐纣，老百姓立刻响应。“盍亦反诸心，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获奖名单

一、获奖专著

- 一等奖（1部）
-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修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作者：杨春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二等奖（4部）
-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论》
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
作者：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2.《马克思恩格斯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作者：李晓光 北京科技大学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作者：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
4.《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22年12月
作者：华正学 浙江财经大学
三等奖（6部）
- 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一至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作者：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问道马克思：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
作者：董振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3.《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理论前提的当代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

- 11月
作者：仰海峰 北京大学
4.《通向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之路——马克思哲学道路的当代阐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作者：张亮 南京大学
5.《中心城市的革命：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及其工人动员（1920—1927）》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作者：张仰亮 华东师范大学
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百年探索（1921—2021）》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作者：蒋永穆 四川大学

二、获奖论文

- 一等奖（2篇）
- 1.《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年第6期
作者：黄建军 北京师范大学
2.《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政治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年第9期
作者：苏立君 南开大学
二等奖（6篇）
-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4期
作者：周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
2.《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时代涵育》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年第11期
作者：崔海英 华东师范大学
3.《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

-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年第4期
作者：侯衍社 中国人民大学
4.《〈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延安整风的发动——兼论整风学习的干部教育新模式的开启》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2年第4期
作者：李东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5.《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年第1期
作者：张洪松 四川大学
6.《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2022年第12期
作者：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三等奖（12篇）
- 1.《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生成与发展》
《思想理论战线》 2022年第5期
作者：金家新 中国药科大学
2.《恩格斯晚年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重贡献》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年第9期
作者：唐晓燕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的科学设定》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年第5期
作者：周杰 上海财经大学
4.《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与批判超越》
《哲学研究》 2021年第8期
作者：周露平 上海交通大学
5.《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

- 巴黎公社的原则及其意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年第10期
作者：刘恩至 清华大学
6.《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
《哲学研究》 2021年第9期
作者：董彪 北京大学
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 2022年第8期
作者：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
8.《强军与胜战：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目标逻辑》
《中国军事科学》 2022年第6期
作者：韩洪泉 国防大学
9.《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
《东方法学》 2022年第3期
作者：王曼倩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古田会议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年第4期
作者：董学宾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
11.《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
《探索》 2021年第6期
作者：刘长秋 上海政法学院
12.《平台经济运行规律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年第6期
作者：蔡万焕 清华大学

三、优秀组织奖

- 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人民出版社

